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纪念建党九十周年书系

启蒙·濡化·创新

中国共产党与文化现代化

李 冉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纪念建党九十周年书系

启蒙·濡化·创新

中国共产党与文化现代化

李 冉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启蒙·濡化·创新:中国共产党与文化现代化/李
冉著.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11.6

ISBN 978-7-5473-0362-7

I. ①启… II. ①李… III. ①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
研究②文化—现代化—研究—中国 IV. ①D26②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05682号

启蒙·濡化·创新:中国共产党与文化现代化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345号

电 话: 021-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1020毫米 1/16

字 数: 210千

印 张: 14.25

插 页: 2

版 次: 2011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73-0362-7

定 价: 26.00元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纪念建党九十周年书系

出版说明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于2010年7月1日在《解放日报》、《文汇报》等公共媒体刊登《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学术活动项目征集公告》,征集上海市社会科学界围绕建党九十周年而开展的学术项目。其中,征集到的研究著作经相关专家严格评审,共有二十六种优秀著作入选,内容涵盖党史、党建、政治学、哲学、法学、管理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部分反映了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近年的相关研究成果。该书系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书系的出版得到了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资助,在此谨表谢意。同时,我们也欢迎广大读者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与建议。

东方出版中心

2011年5月

引言 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

文化现代化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早在晚清时期,随着传统文化统治地位之塌陷,文化现代化就已经在事实上展开了。如今,漫漫征程已过百年,却还不能迎来它撞向终点线的一刻,此谓之久。文化现代化又是如此地“善变”,它发生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变革时代,激烈的政治革命、深刻的社会转型尤其是伟大的改革开放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价值与功能,此谓之新。

对于这样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该怎样去把握呢?作为本书的开篇,遵照所谓的学术规范,免不了要交代一下概念的内涵。但是,笔者不打算这么做,既不会借用已有的概念,也不会提出一个新的定义。或许,界定文化现代化的定义并不是一件出力就能讨好的事情。原因有二。第一,文化现代化是千人千面的“哈姆雷特”。“一千名读者就有一千名哈姆雷特”,这条审美的规律也在文化现代化的解读上得以呈现。纵使每一位大师、每一个学科皆能给出它明晰的界定,但却至今无法取得广泛的社会共识。文化现代化的概念并不是好下的,它关涉到文化、现代化、现代性、传统、启蒙、革命、理性、自由、民主等思想史上争论了几百年的重要议题。我们佩服那种在一篇文章中就能下定义的勇气,但是笔者却做不到。于是我们发现,文化现代化的大旗从被扛起来的那一天就是一面没有符号的旗帜,至今我们都不知道应该把一个什么样的符号绣上去,来表达一个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对文化现代化统一而又明晰的理解。第二,文化现代化的概念是“遥看近却无”的“草色”,让人难以把握。中国社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渴望着文化的浸润与心灵的抚慰。在经历了资本与物质的冲击、信仰世界的塌陷之后,我们开始追寻得到的意义、逝去的代价、幸福的源泉甚至是生命的价值。这是一个

多么渴望文化和文化现代化的时代。但是,在文化现代化的理论花园中,当我们伸手去采摘那一个个“概念”之“果”的时候,才知道它只是一个难以具象的传说、不能解渴的“果子”。渴望拥有但却触摸不到,这是一种令人失望甚至是恐惧的感觉。知识精英的学术研究与社会群众的朴素观感之间的严重“供需”脱节,这又是一幅让人哭笑不得的场景。在概念上饶舌,很多时候就是一个书斋里或“圈子里”自娱自乐的游戏。这种“书斋里的学问”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开启民智、凝聚共识、疏导心灵呢?

让我们把有限的学术精力和好不容易聚焦起来的学术注意力,从西方话语及思维气场中抽取出来,从概念的推演和纯粹的思辨中抽取出来,投向那些更具现实意义的问题上吧。什么叫现实?最大的现实就是中国国情。中国国情对其文化现代化具有内在的规定性,这种规定性本书称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本质。中国的文化现代化和一般的文化现代化有本质上的相通,更有本质上的相异——主要体现在特征不同以及由此决定的路径不同。我们要关注“相通”,但更应该关注“相异”。解决中国的问题就要充分把握中国的特点,解决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就要充分考虑到中国国情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本质规定性。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却是本书的基本写作立场。“中国是不能仅仅用西方术语的转移来理解的,它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生灵。它的政治必须从它内部的发生和发展去理解。”^①让我们先从文化现代化在中国的“出场”问题谈起来。

① [美] 费正清、[英] 麦克拉夸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15页。

目 录

引言 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	1
绪论 研究现状·“乱象”追问·分析框架	1
一、作为术语	1
二、作为理论	5
三、作为事件	8
四、作为对象和目标	9
五、“乱象”与追问	11
六、语义场原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一个分析框架	13
第一章 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史叙事：语义场更替的视角	16
第一节 民族国家的语义场	16
一、封建社会的“稳定器”及其失灵	17
二、大转型的价值指向：民族国家	20
三、一个历史的“隔段”与文化现代化的“胎动”	26
四、余论：两个可能的质疑	29
第二节 政治革命的语义场	31
一、政治革命：一个划时代的主题	31
二、政治革命语义场的形成、强化与转型	33
三、意识形态文化观：政治革命语义场对文化现代化的方法论 培育	42

四、政治革命语义场中文化现代化的两大成果	51
第三节 社会革命的语义场	52
一、马克思主义对社会革命的普遍理解	53
二、中国语境的特殊性及其社会革命的三种解读	55
三、社会革命语义场中文化现代化的“多重变奏”	56
四、“延迟的社会革命”与文化现代化的“双向运动”	59
第二章 启蒙·濡化·创新：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现代化	62
第一节 思想的启蒙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62
一、西方的启蒙：技术路线与哲学路线	63
二、中国的启蒙：“革命路线”与“大众的革命式启蒙”	66
三、对“革命压倒启蒙”批判的批判：基于政治革命语义场的 省察	76
四、大众的革命式启蒙：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种解读	81
第二节 文化濡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95
一、文化形态·文化运动·濡化	96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组织前提与发生机制	106
三、马克思主义的党内本土化	113
四、党文化的社会化	130
第三节 新时期的文化创新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144
一、文化范式的转型与邓小平的文化思想	145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文化现代化的新动向	150
三、十六大以来的文化创新与民族国家的取向	163
四、新时期文化创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本质	167
第三章 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当代处境与路径突破	173
第一节 当代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本质及其问题	173
一、“去伪存真”：澄清一些错误的观念	174
二、文化现代化的本质	178

三、当代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处境及其问题	181
第二节 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路径择取	187
一、党文化的示范与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建设	187
二、双向运行机制的贯通与政治文化化的突破	196
三、现代民族国家的取向与核心价值体系的构筑	207

绪论 研究现状·“乱象” 追问·分析框架

文化研究与现代化研究的第一项工作往往是正本清源、厘定概念，这是因为“文化”和“现代化”的内涵和外延都极为模糊。由这两个下位概念构成的“文化现代化”，自然也是“出身不凡”，有着“看我七十二变”的理解。文化现代化研究，就是以这样一个善变的概念为起始点的，其研究的难度是可以想见的。此外，当“文化现代化”前面加上“中国”这个限定词的时候，问题将变得更加复杂。强大而悠久的文化传统、社会主义的政权性质、现代化特殊的历史方位等等，都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理论及其实践带来了重要的内在规定性。总之，由于“变量”较多，学术界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回答差异很大，甚至可以说是一团“乱象”。对于这些学术研究的“乱象”，有必要加以呈现，这是进一步研究的起点。此外，追寻“乱象”背后的故事，这本身也是一种有趣的学术体验。

一、作为术语

我们首先考察作为“学术术语”的文化现代化。作为“学术术语”，我们很难追寻到文化现代化的起源。不知道是谁在何种背景下第一次叫响了这个名字。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指出：“在学术界，现代化这一概念是比较新的。它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于北美由一些社会学家，尤其是由塔尔科特·帕森斯最先提出的。”^①但是，在国内现代化这个词出现得并不晚。罗荣渠指出：“到 30 年代，‘现代化’一词开始经常出现在报刊上，成为议论的热门话题。后来抗日战争爆发，全民族的注意力转向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现代

① 杜维明：《多种现代性：东亚现代性涵义初步探讨》，载[美]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主编：《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72 页。

化这个大课题一时似乎销声匿迹了。一直中断了几十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当国家全力转向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中心内容的新的发展轨道之后,现代化才重新成为热门话题。”^①显然,作为一个正规的学术术语,“文化现代化”这个名字被叫响也应该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情了。在这里,我们不禁要问,文化现代化的探索至少在新文化运动就开始了,为什么这个学术术语却迟迟没有被使用呢?或者说,文化现代化作为一个概念的出现与作为一项运动的展开,这之间的“时差”为什么如此之大呢?这可能与人们对文化的理解有关。尽管在1915年前后人们就觉察到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的转型是个紧迫的时代命题,但是在社会大动荡的环境中,人们还不曾有空闲去深入而又冷静地探讨文化转型的机制与方法,因而,文化仅仅是社会变革主张的一面旗帜,是一个极为宏观的“政治符号”。正如许明所讲的:“在这段时间里,文化建设的正常秩序已被打得七零八落,中国文化的飘零花果只是在少数知识分子顽强的坚持下才没有败落。……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动乱的中国只是在最紧迫的政治问题上让历史作出了选择。”^②所以,在那种历史环境中,文化现代化的术语创设是没有太多必要的。人们关心的是现代化,文化只不过是个旗语、符号。我们甚至可以这样推测,即使有“文化现代化”这样一个学术术语,它指称的范畴也会远远大于文化,或者说是现代化的代名词。

作为“政治术语”,党的正式文献并没有明确提出“文化现代化”的概念,但是从政治文本来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文化现代化战略已经被明确阐释了。这一点会在以后的内容中加以说明。在此,仅对作为政治术语的文化现代化概念的发端,做出文献上的梳理。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胜利的时刻,毛泽东对于今后的工作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总的观点,即党的任务从革命转向建设。1949年6月1日,毛泽东在致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的信中说:“革命战争迅速发展,残敌就歼为期不远。今后工作重心在于建设,亟盼各方友好共同致力。”^③这里所说的“建

①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版)序言,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页。

② 许明等:《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页。

③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3页。

设”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呢?在毛泽东后来的阐述中逐渐明晰了,主要是指我们熟悉的“四个现代化”,而且包括文化现代化的内容。

1949年7月1日,中共中央给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贺电(此贺电经过毛泽东修改后定稿)中指出:“我们中国是处在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的情况中。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任务主要地就是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①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彻底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以后,毛泽东将注意力再一次放到“如何建设”的问题上,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指出:“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②在以后的不同场合,毛泽东不断将这个“总目标”具体化,而且强调了文化现代化的内容。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在大会开幕词中提出:“我国人民应当努力工作……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③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使用“现代文化程度”的概念,在随后10月18日的讲话中毛泽东又第一次把文化与工业、农业、军事并列,他说:“我们现在工业、农业、文化、军事还都不行,帝国主义估量你只有那么一点东西,就来欺负我们。”^④

此后,毛泽东开始使用包括文化现代化在内的“三个现代化”来说明党今后的任务。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在谈到专政的目的时他指出:“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⑤3月12日毛泽东又在中共中央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到:“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⑥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亲自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认真研

①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389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7页。

⑤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7页。

⑥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8页。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通过对当时国防形势和苏联经验的分析,毛泽东提出要实现国防现代化,并把“三个现代化”修正为“四个现代化”。毛泽东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①这里所说的“原来要求”,就是指以前的“三个现代化”。

1960年3月18日毛泽东在同尼泊尔首相的谈话中,重申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他说,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安下心来,使我们可以建设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和现代化的国防。你们也要安下心来,搞现代化的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和国防,这不好吗?”^②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后来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的直接来源,正如邓小平所说的:“我们现在讲的四个现代化,实际上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是周总理在他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出来的。”^③

但是,1964年12月21日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对外公布今后的战略目标时,“文化现代化”并没有包括在内,周恩来提出:“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④1975年1月13日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再一次提出这个目标,从此以后“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口号才真正传播开来。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1957年的“三个现代化”和1960年的“四个现代化”中都包括文化现代化的内容,是把科学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合起来讲的。但是,文化现代化的内容并没有在后来的政治文献中保留下来。

1960年初,全党掀起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热潮。周恩来在2月13日到达广东从化组织读书小组。周恩来在谈到学习体会时发表了对于四个现代化的看法,并提出将“科学文化现代化”改为“科学技术现代化”。《周恩来传》曾经提到:周恩来指出,四个现代化的主要内容是:“工业、农业、科学、国防

①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1—312页。

④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9页。

四个现代化”，这个提法比他在 1954 年第一次提出的“四化”内容，即“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又进了一大步^①。我们看到，在党的文献中曾经有两个“四个现代化”之说。周恩来在 1954 年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是针对落后的经济而言的，他指出：“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②毛泽东提出“三个现代化”继而发展到“四个现代化”，是基于落后的经济和落后的文化而言的。

二、作为理论

关于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理论主张也是“派别”林立，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理论之“乱”。所谓理论之“乱”，主要有两个依据。第一，理论观点的多元与实践中的一元相比，是谓之乱。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实践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展开的，这种实践中的一元性并没有在理论研究中等价地反映出来。相反，从理论研究来看，自由主义文化观、保守主义文化观、后现代主义文化观不断制造着研究热点，并成为一种研究的“时尚”，蔚为壮观。倒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研究显得沉闷和冷清，这与文化现代化的实践不相匹配。第二，理论之间的分歧大于统一。尽管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理论派别之间的统一性正在积累和凝聚、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一定是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创新说、21 世纪是“三分天下而合一”的世纪，但是，这种对未来的乐观预计更多是基于中国共产党长期稳定执政所做出的一种政治性的衍生结论，并没有给出足够学理性的论证。事实上，从过去和当前来看，关于文化现代化的理论主张是分歧大于统一。

关于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理论主张，张岱年在 20 世纪末曾经有个评价：“纵观整个 20 世纪，在‘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三种主张，即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论，保守主义的儒学复归论和马克思主义的综合

^① 《周恩来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 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32 页。

创新论。”^①这个说法影响深远,三派理论也得到了较为充分的研究。但是,自后现代主义传入中国以来,这“三分天下”的局面就已经开始变化了。现在有学者提出了“四分天下”之说,这也是很有道理的。鉴于三派理论已经得到了较为充分的研究,此处仅就后现代主义文化现代化理论做些梳理。

后现代主义产生于20世纪50—60年代,在70—80年代获得追捧,90年代以势不可挡的气势传入中国,影响深远。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不像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潮那样有着齐整的理论体系,相反它比较“零碎”,是由众多观点各异的思想家从不同角度提出的一系列否定性批判所构成的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源于工业文明的异化。19世纪下半叶以来,特别是在20世纪,现代西方工业文明在创造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的失衡、人的异化和物化,导致道德体系的崩溃、社会结构的解体、生态环境的破坏、心理平衡的打破等负面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分析并修正现代工业文明的负面效应,就成了现代人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个历史使命首先被后现代主义的学者们所拾起。

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学术地位应该被寄予更多的重视,它应该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理论的重要流派。这种判断是基于以下两个根据。

第一,作为事实,后现代主义对中国的文化现代化研究产生了直接的推动作用。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事实上,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后现代主义已经在以池莉、方方、刘震云等领衔的中国‘先锋派’小说中得以模仿、学习和繁衍。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现代主义如洪水猛兽般进入中国社会乃至思想文化领域的各个角落。缘于此,王岳川、王治河、张世英、衣俊卿、张颐武、郑家栋、李翔海等学者,纷纷致力于后现代主义的研究,期望通过视野的转换和文化比较的‘积淀’,来建构中国特色的文化现代化大厦。”^②

第二,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反思、批判、修正甚至是否定,为中国文化现代化制造了广阔的历史空间。这种“空间”可以从两个层面加以说明。一是在文化的“中外”问题上,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对西方工业文明和现代性的批判抬升了东方文化、中国文化的世界地位。美籍学

① 张岱年、王东:《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和综合创新》,《教学与研究》1997年第5期。

② 李武装:《中国“文化现代化”研究的四大流派及其方法论回观》,《探索》2010年第3期。

者萨义德的《东方学》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被引入到中国,这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萨义德认为,东方学(orientalism)是西方人所建构的一套关于东方的认知与知识系统,在这套话语系统中,东方被置于西方文化的权力话语之下,成为一个被剥夺了话语权的他者,一个不会表达自己因而只能由西方来替他表达的对象^①。这一理论能引起中国学者的共鸣,不能不说与后现代主义带给中国学者的微妙心理体验是有关联的——那就是西方文化统治地位的塌陷给中国文化国际地位的上升提供了契机。所以,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无论是保守主义的儒学复归派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创新派,都异口同声地喊出了 21 世纪中国文化复兴的口号。二是在文化的“古今”问题上,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现代性的批判抬升了传统文化的地位。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被动性的批判,它带有主动性的探索,即从传统中寻找医治现代性弊病的文化资源与方法。这种思想被现代新儒学发挥到了极致,有观点这样认为:“儒学,特别是它的形上本体论及生死观是我们走向 21 世纪的重要的精神依据之一。它可以开阔我们的精神空间,避免价值的单元化和平面化,避免现代化所预设的价值片面夸大,并批判其负面,批判工具理性的恶性膨胀。……儒家的精神对 21 世纪社会和人生负面的治疗和拯救,尤其是对人性和人心的安立,肯定会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②总之,随着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力扩大,人们的文化观也在发生变化(当然根本原因还是世界及当代中国物质生产发展水平的变化),一方面从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中走出来,另一方面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盲目排斥中解放出来。只有具备了这样的心智前提,中国文化现代化才能真正落地,并找到可操作的实践路径。

需要说明的是,在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其实并不算新事物。早在 1920 年梁启超就在《欧游心影录》中宣传了这种思想。梁启超认为,欧洲战场上的残杀行为是西方物质文明所致,残酷的战争宣告了以利益追求和利己主义为特征的西方文化的破产,并主张用中国文化拯救西方工业文明。他写道:“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那边有几万万人,愁着物

① 参见[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年版。

② 郭齐勇:《儒学的生死关怀及其当代意义》,《社会科学战线》1995 年第 4 期,第 70 页。